

“传奇”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 (1957—1961)

廖秀芳

内容提要 1957年初版的《林海雪原》，经评论界剖析，“传奇”色彩凸显，引发了革命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的命名。随后几年其“传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承认、质疑与回护，成为评价《林海雪原》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引出了当代文学史的一系列命题。“传奇”从依附“民族风格”到与“革命浪漫主义”连通，经李希凡阐释后在《林海雪原》中焕发最为强烈的新质，但它仍有难以摆脱的老问题。“传奇”之尴尬，也反映了革命英雄传奇在新文艺整体构建中的处境。

关键词 《林海雪原》；传奇；民族风格；革命浪漫主义

1957年9月初版的《林海雪原》，引发了革命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的命名，并被当代文学史确认为该类型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小说^[1]。新时期以来，学界对其醒目的“传奇”特征，除视为此书作为当代优秀长篇小说乃至“红色经典”的某类特点，亦不断再阐释，或引出重英雄的绿林传奇收编于“革命历史小说”时越轨的江湖想象，或揭窠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隐形结构”暗含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因素的服从，或由此考察革命叙事对中国传统小说母题、叙事模式、叙事资源的袭用与改造，或探讨其在“革命”与“通俗”的相互利用与对抗中何以重新复活等^[2]，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等不同学术路径予以阐述。

这些基于新的语境与视角的成功诠释，当然是对《林海雪原》及其“传奇”意味的打开，但也不免导向对其合乎范式与预设的定型化的抽取。如同《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的生成有参照即时评论修改定型的过程^[3]，《林海雪原》之“传奇”特性亦是在当时评论中生发、流转、固结。“传奇”之于《林海雪原》，实非一种不言自明、固定不移的属性，而是一抹需要被评论家点出并阐释的异采，并且随着文艺方针的变化与指摘的突如其来，还需加以新的点化与回护。

参考1990年汇集的《林海雪原》评论目录^[4]，可知《林海雪原》初版后三四个月里，书评多系此书编辑龙世辉所撰。其文主要介绍小说是曲波根据亲身经历写成，表现了战士的英雄形象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读者有不同层面的教育鼓舞意义。龙世辉虽已注意到曲折惊险的情节和分章分节的叙述对读者的吸引，但仍将本书最根本、最成功的地方，指向作品中英雄人物的鲜明形象^[5]。他不忌以“传奇式的”^[6]形容少剑波等英雄，以显扬英雄斗争之艰巨、精神之崇高，但不曾指出小说故事情节层面的“传奇”。在读者反映故事曲折多变后，他也只是敏感地与“惊险小说”的离奇与猎奇拉开距离^[7]。显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新英雄的成规下，叙事之“奇”毕竟品位不高，还有偏离真实的风险。然而，在对叙事之“奇”的规避或超越中，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不久后即成为《林海雪原》突出色彩的“传奇”。

《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如何被点出与接受，可由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编辑出版的《〈林海雪原〉评介》观之。这本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评

论专辑，特以《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的《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打头。这篇原刊于该年第3期《文艺报》的长文，开篇亦已显示了强烈的辅导读者的批评自觉。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谈起，在此整体视野中给了《林海雪原》一个近于“普及”而非“提高”的定位：“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但“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8]。

比之于龙世辉的评论，侯金镜做了一个翻转：《林海雪原》之所长并非对英雄人物的描写，而是依托“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达成的普及性。因而不难理解，在认可本书产生于生活这“唯一源泉”后，侯金镜转而突出此书的两大优点是“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感情；接近民族风格并富有传奇色彩的特色”^[9]。《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由此凸显，但不像革命英雄主义和民族风格在当时的理所当然，“传奇”因与“奇”“旧”的暧昧关联而需加以辨析。侯金镜接下来对《林海雪原》的解读，也确实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处理得精巧圆熟的特色。

侯金镜不从情节或人物入手，而先分析小说的环境描写。他暗示林海雪原的自然环境是故事得以演绎近四十万字的基础，不然“一小撮不堪一击的国民党匪徒”不会是小分队的劲敌；而小分队仍然消灭了匪徒、驯服了天险、欣赏了大自然雄伟壮丽的奇景，这便表现了小分队英雄战士的革命气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释自然环境如何给本书“平添了不少传奇色彩”。首先，他指出给林海雪原蒙上“传奇的轻纱”的灵芝姑娘、李鲤姑娘等传说，寄托了人民战胜邪恶的意志和美丽的理想，把大自然人格化，使大自然和人民共悲苦、共欢乐。其次，他把小说中闪现的“传奇性的人物”蘑菇老人与姜青山，阐发为善良坚强的劳动人民的象征和林海雪原环境的生动陪衬，以他们的性格象征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的性格。这样的诠释既缓解了这两个人物性格描写具体性方面的不足，又通过揭示他

们的象征意涵而使“传奇”、劳动人民和大自然的粘合更加紧密。如此，小分队消灭匪徒，也是在保卫能够体现人民精神的壮丽河山不被匪徒玷污，小分队的精神境界也就被烘托得更加崇高^[10]。通过对环境描写的大段分析，侯金镜实际铺开了绵密而多层次的阐述，把“传奇”渗透在人民人格化了的大自然的性格中，显示出其烘托革命精神的积极意义，从而婉转地把它合法化、积极化。

对照此前龙世辉对《林海雪原》环境与传说的评述，更可察见侯金镜解读的功夫。龙世辉把小说特殊的自然环境，视为小分队在剿匪斗争外还有对自然的斗争，须战胜天险和饥冻；对于书中的几个传说，也只表示增添了喜剧气氛、浪漫色彩和宁静情调^[11]。侯金镜的阐述明显更复杂，他不仅要指出环境与传说的传奇色彩，还要结合小说主题拔高其精神，赋予“传奇色彩”以积极的因素。当然，阐释的复杂度，本身也透露出对“传奇”的警惕，这是后话。他此时的任务还是温和地从小说中点出这抹异采，然后又妥帖地将其安置回小说中。因而起首就把“传奇”流畅地转化到小说的整个环境，是极具洞察力与技巧性的举动。后文带到小说的主要人物、表现方法所渲染的传奇色彩，只需立足于“小分队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12]，便可应付自如。情节的夸张若和当时的环境气氛相协调，那么“传奇性的异采”便能在小说中得到安顿。

侯金镜之后，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王燎荧等发表在1958年第2期《文学研究》上的评论，继续强化了《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特别是王燎荧的《我的印象和感想》一文，原创性地把《林海雪原》称为“革命英雄传奇”，为这一特殊的小说类型命名。他总结此类小说的特点是“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使革命英雄行为更理想地富于英雄色彩”。他解释现实革命斗争中确实有异常勇敢的人物和出奇制胜的行为，这些人和事随即在口耳相传中会被夸大若干倍而添神奇与传说性质，这背后是“革命群众从对革命胜利的愿望出发所产生的一种心理”^[13]。他这样既给出了读者欢迎《林海雪原》的正当理由，也道出了小说生成时许多事件富于巧

合、某些人物近于神化的原因。

显然，王燎荧有意从群众心理层面为《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提供合法性，而其解释过程又折射出他与侯金镜对“传奇”具体内涵把握的差异。在王燎荧那里，传奇色彩主要指事迹的夸大、情节的巧合，关乎作者编造故事的才能，指向《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影响^[14]。在侯金镜那里，传奇色彩首先是渗透在自然环境中，关联象征性的人民性和革命精神的意涵，有更复杂的层次。其次，侯金镜论人物形象时也提到传奇色彩，但他的说法是：小分队在这特殊的环境和敌人斗智斗勇，故事本身存在传奇的魅力；何况作者在故事主线上不写日常生活，而把主要人物放在重大冲突和惊险的情节中表现，并适度夸大他们的行动，那他们身上必然显出传奇色彩。这颇为纠结的阐释方式，表明他在提出故事和人物的传奇色彩时，就在做贴合情境的淡化处理。另外，侯金镜虽也论及“无巧不成书”是古典小说习用的手法，但他还是把偶然性的情节对传奇色彩的渲染表达得相当隐晦和节制^[15]。

要言之，王燎荧是把《林海雪原》的传奇性集中在叙事上，并看到了这背后的普遍性；侯金镜则更着眼于《林海雪原》的特殊之处，并有意稀释其叙事上的传奇性。前者突出的是故事情节的不平凡以及情节构造的充满巧合，对此的承认又实为对群众一般阅读趣味的纵容。后者未必不知其然，但其评论的出发点即是要对读者起积极的引导作用，因而他层层析出《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使之贴合小说特殊的情境并分散、拔高，不将“传奇”直指故事情节的不平凡及偶然性。但此“传奇色彩”经侯金镜点出后，便渐渐剥离了他诠释中复杂的过程。人们更能领会的或者说更有共鸣的，还是王燎荧阐释的“传奇”^[16]。这也符合常识。毕竟，传奇若指称一种唐以来的小说样式，则“征异话奇”是基础，强调的是故事的不寻常^[17]。引入“革命通俗小说”概念，将《林海雪原》置于延安时期开始创制的这一小说类型中，更知其对古代“英雄传奇”的借鉴，尤其在叙述模式方面^[18]。

王燎荧阐释的“传奇性”包含的一些要素，当时还关系到另一些共识，即故事性强、戏剧性强、富于巧合等古典小说的传统。古典小说蕴藏“民族

形式”“民族风格”，这些又都和读者面广、普及性大有关系^[19]。上述概念各有其含混与不稳定，但不妨碍其间存在着宽泛的相关关系乃至因果关系。就《林海雪原》而言，这样的话语理路首先体现在作者的创作自白中。曲波自陈其写作是为了使更多工农兵群众看到小分队的事迹，因而在《林海雪原》的结构、语言、故事组织、人物表现等方面力求接近民族风格，其意是要像《三国》《水浒》《说岳全传》那样易于记忆和口传^[20]。小说流行后，评论界的肯定也大体延展在此逻辑链上。如何其芳说《林海雪原》学习了古典小说的写法，把民族形式与新的内容结合，很吸引读者，“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21]。且其故事便于改编搬演，能以广播、戏曲、说唱艺术等形式深入到文盲或半文盲听众中去^[22]。

在古典小说、“民族风格”、普及效果层递的逻辑链中，集中于叙事的“传奇性”，可以在故事性强、戏剧性强、富于巧合等方面承接古典小说，进而依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在“普及”中得到一个较为积极的位置。然而，古典小说的性质本身也不单一，既有符合“民族风格”的部分，也有不被其接纳的“陈旧”。《林海雪原》的评论中，亦早有人将陈旧的词句、个人英雄主义色调、英雄美人色彩等，归于受了古典小说的坏影响^[23]。所以，上述逻辑链原则上通行，但对具体作品而言又常显脆弱。一旦撇开这个理路，故事情节的夸张与巧合，可能就会在新的审视中不真实得无以立足。

二

1958年侯金镜、何其芳、王燎荧等人对《林海雪原》的评论，以及收录这些文章的《〈林海雪原〉评介》，对当时读者接受《林海雪原》起着指导和规范作用。在此影响下，《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普遍还是一个受读者喜爱的特点，小说其他的优缺点也已妥帖分辨。次年《人民日报》即有文章表示，《林海雪原》不必一评再评^[24]。其后《文艺报》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49年以来优秀创作目录，《林海雪原》在其中^[25]。似乎《林海雪原》

总体优秀，已无需赘论。虽然这优秀有瑕疵，编辑龙世辉在1959年9月再版本中还根据权威批评删除了少剑波“个人突出”的“少帅”等形容，削减了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26]，但这本身也从侧面表明此时对《林海雪原》的指摘还是一些达成共识的、相对局部的问题。

弥漫全书的传奇色彩如果成为问题，那却是想要删减也无从下手的。1961年《林海雪原》电影公映后，确也引出了一篇这样近乎全面否定原小说的文章，即冯仲云的《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在这篇5月9日发表于《北京日报》的评论里，冯仲云将电影《林海雪原》的缺陷归咎于同名小说，继而展开了对原小说的批评。他先指出小说不真实，其一，在历史事实上，歼灭谢文东等土匪是三五九旅配合牡丹江军区和合江军区的军民艰苦战斗的结果，而非少剑波领导的小分队凭智勇所能解决；其二，地理地形上，书中的描写也夸张得脱离现实。所以小说非如曲波所言“是按照我的经历写的”，其实“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并且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在军事上也是传奇性，武侠式，不真实的”。然后他退一步表示，即使不以真人真事为标准，小说也没有写出时代的斗争和动力，少剑波和白茹也不大值得学习，故其思想性不强、教育意义不大。他的核心结论是，《林海雪原》“很难称为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27]。李希凡稍后反驳冯仲云时，总结性地指出其论断“实际上是关系到像《林海雪原》这样的传奇性的小说能否流传的问题，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28]。《林海雪原》的传奇性，转眼在新的审视中成了威胁到自身存续的存在。

其实，《林海雪原》的传奇性被点破之初，便潜伏着危机。1958年侯金镜等人的评论，对传奇色彩就有所保留，透露出因读者喜爱而妥协的姿态。或如研究者所言，此时当代文学在形式问题上隐约表明了一种与读者和解的愿望^[29]。因而，何其芳的文章里虽对传奇色彩“有些掩盖了它的根本思想内容”有一丝忧虑，但还是马上转圜，落脚于小说题材与形式的和谐^[30]。而且他的忧虑是建立在认可《林海雪原》根本思想内容的基础上，传奇色彩哪怕强烈，消极影响也只到对其思想内容有所

掩盖的程度。到了1961年冯仲云那里，“传奇性”则直关“不真实”，且这“不真实”与“传奇性”贯彻整部小说，致使其根本思想内容也与革命现实主义不相符。冯仲云的否定更为彻底，“传奇性”的危机也更为严峻，以至于涉及《林海雪原》这样具有传奇性的小说能否流传的问题。

冯仲云对小说的真实性有如此强烈的诉求、对传奇性如此排斥，与其经历很有关系。他曾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是东北抗联的老同志；抗战胜利后，他根据陈云的指示撰写了《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1960年前后，他还多次为东北地方党史资料的编辑回叙东北抗联的情况；平日，他个人公开发表的文字也多为革命历史回忆录性质^[31]。如此说来，冯仲云对东北的抗联历史、地理情况很熟悉，并且相当重视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整理。不过，他倒也并非总以真人真事衡量文艺作品。1960年3月评电影《金玉姬》时，他即表示，比起是否根据真人真事写成，他更关注本片艺术概括的真实，认可其接触到抗联战斗生活的许多问题^[32]。或许可以说，他是看重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抗联历史的真实，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有对此加以判定的资格与使命。

冯仲云对《林海雪原》的“传奇性”与“不真实”的批评，直接依据是其亲身经历与见闻，背后的否定性力量则依托革命现实主义。就此而言，他确实抓住了《林海雪原》的薄弱项，也看到了此前评论界有所克制的一面。比如，侯金镜就曾表示现实中小分队里不会有白茹这样的人物、更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爱情，这里作者“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33]。虽然他听曲波解释后接受了白茹的存在，但也希望作者改变写法^[34]。另外，针对小说不写杨子荣在真实战斗中的牺牲，何其芳也批评作者未能更真实地反映出过去武装斗争的复杂性，他说“也许有人会用浪漫主义来为这个缺点辩解”，但那也不是“在根本精神上 and 现实主义一致的浪漫主义”^[35]。冯仲云的批评不是接着侯金镜、何其芳讲的，因为他对历史真实和革命现实主义有他的理解与诉求，但他也看得到此前评论中《林海雪原》在现实主义方面的脆弱性。

可是，一些描写方法不符合现实主义和整部作

品不符合革命现实主义，二者之间毕竟是性质的不同；将“传奇”与“武侠”“不真实”“脱离现实”并置，也是对“传奇”致命的打击。在《林海雪原》广受好评时，冯仲云这样强烈的否定势必会引起讨论。而《北京日报》副刊《文化生活》对多样化的栏目、群众性的评论的提倡^[36]，以及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后政治气氛的松动，也为此讨论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于是，《文化生活》副刊特开辟“笔谈《林海雪原》”专栏，三个月发表文章二十多篇，并将其中的十八篇和编者的总结汇编为《笔谈〈林海雪原〉》，并于该年年底出版^[37]。集内文章经过选择排序，更加清晰地呈现了冯仲云文引出的问题和此次讨论的走向。

讨论中，支持冯仲云的观点多为复述性的，且发表在笔谈前期^[38]；明显占上风的是对冯仲云的反驳，且这些反驳基本出自文艺工作者之手。反驳的重心，是针对冯仲云的批评阐明两点：一是《林海雪原》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也有教育意义；二是传奇色彩不违碍革命现实主义，更不是武侠。关于第一点，很快就有人表示历史真实不等于文学真实，文学反映现实生活而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应该有概括、想象和夸张，以此说明，冯仲云之所以否定《林海雪原》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是因为他没有分清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的区别^[39]。接着，在教育意义上，有评论提出文学作品主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教育读者，杨子荣等英雄典型是读者学习的榜样，而有缺点的少剑波也可被批判性地学习^[40]。另外还有人谈感人的力量，认为“惊险小说”没有像《林海雪原》那样广受读者喜爱，说明作品感人的力量不在于情节曲折或传奇色彩，而在于小说反映了新的精神和内容，其思想性与教育性就在其中^[41]。

这些论述不能说逻辑完全自洽，但至少找到了历史真实不等于文学真实这个立足点，从而在理论上为《林海雪原》历史事实与地理地形的不真实开脱，维护其革命现实主义的品格，并在此基础上肯定其教育意义。然而，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允许想象和夸张，也不代表可以到“传奇性”的程度。也就是说，即使证明了《林海雪原》内容与思想上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也不能证明充斥其中的

“传奇性”没有违背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传奇性”，仍然是一个需要特别处理的问题。

这方面，与论者大抵是沿袭1958年《〈林海雪原〉评介》提供的思路，从继承古典小说、具有民族风格、读者喜闻乐见的意义上对“传奇性”加以回护。如改编过粤剧《智取威虎山》的林涵表，即把《林海雪原》传奇性的手法，放在“民族风格”“民族特色”中去谈其成功^[42]。又如在为此次笔谈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虞棘开场便提示对《林海雪原》传奇色彩的认可主要在于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对古典小说的继承^[43]；随后《解放军文艺》总编陈亚丁发言，也表示《林海雪原》的传奇手法是其突出优点，吸引了广大新文艺读者与大批旧小说读者，认为这是新文艺创作的可喜成就，其销量之大就是最好说明^[44]。

前文已言及古典小说、“民族风格”、普及效果这些概念有其含混与不稳定性，对具体作品而言其间的连接是脆弱的。古典小说也有“坏”元素，不全属于“民族风格”，销量大也不等于影响好。所以，承接古典小说的“传奇性”与“民族风格”的联系是间接且含糊的，它并不能就此拥有理论原则上明确的合法性，亦不能就此证明它没有对革命现实主义构成违碍。林涵表、陈亚丁在当时特意探讨《林海雪原》的传奇性，但他们的方式也几乎只是观点的表露，说它不是荒诞无稽的卖弄情节、不影响作品主题思想的发挥，而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优点等。他们对“传奇性”的认可，实际呈现为简繁不一的表态，缺乏论证过程。或者说，将“传奇性”与古典小说、“民族风格”、普及效果相连的思考理路，本身就只能存在于文本的外部、延伸之处，很难落回《林海雪原》小说之中，证明其不违背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而在这个延展于文本外部的话语理路中，“传奇性”本身也没有可以直接站定的不证自明的合法位置。这是症结所在。

三

这次讨论，据《笔谈〈林海雪原〉》编者介绍，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稿件四百多篇^[45]。讨论中途，1961年第3期《文学评论》即有文章

对此做简要介绍^[46]。7月5日,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文艺处和《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专就此次讨论召集部分在京部队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47]。笔谈结束后,《光明日报》还刊发“本报讯”报道这场关于《林海雪原》的群众性的讨论^[48]。可见,这次笔谈不仅得到普通读者热情参与,也颇引起文艺评论界注意。在特别强调对读者做出引导的时代,必然会有相对权威的文章来收束此次讨论。这次起总结定调作用的,即李希凡8月3日发表于《北京日报》的《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

李希凡此文,主要还是针对冯仲云的批评,为《林海雪原》的传奇性与真实性辩护。他指出,对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出了理论原则上的规律性的解释,即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49]。这倒不是说《林海雪原》一定更如何,而是在论辩时可据此抓出符合要求的点,论述的理路很明确。“传奇性”则不然,它没有直接的理论依据,为其辩护需落实到小说中而展开具体论证,而前面笔谈中肯定“传奇性”的文章没有做到这点。李希凡此文的首要工作,便是展开这个论证过程。

李希凡以介绍《林海雪原》惊险的情节、浓郁的传奇色彩开始,迅速落到杨子荣献礼等章节道:“你会感到《林海雪原》的富有传奇性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在这些章节里更得到了发扬。”^[50]这段话以略带亲切的语气,策略性地使“传奇”一出场就与“革命浪漫主义”直接挂钩。“富有传奇性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的提法,作用不是让革命浪漫主义富有传奇性,而是让传奇性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这样,“传奇性”就以貌似自然的方式升格了。对“传奇性”的论证,实则从属于对“富有传奇性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论证。

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中国之初,革命浪漫主义便是其有机组成部分;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则把革命浪漫主义从此从属位置提升到跟革命现实主义并立的地位^[51]。经周扬阐释,“两结合”成为“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52]。革命浪漫

主义强调表现英雄的气概、奋发的精神、强烈而明朗的感情^[53],塑造英雄超强的意志、品质和能力,体现正义必然胜利、革命理想必然实现等倾向性^[54],这里的想象与理想化包含“传奇性”的因素;而在对新英雄人物及其事迹传奇式的书写中,新的思想内容与感情倾向也会使之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质素。是故“传奇”与“革命浪漫主义”,在艺术手法及理想化过程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连通。

在此理论背景下,《林海雪原》起初归于传奇性的某些因素,如环境与故事的不平凡、英雄人物的高度机智,即可被转移到革命浪漫主义名下^[55]。因此李希凡把传奇性与革命浪漫主义挂钩,在当时并不突兀,只是此前还没有人像他这样把二者关联得如此紧凑。另外,笔谈前期讨论者倚傍“民族风格”的论述,实已不足以回应“传奇性”如何直面革命现实主义的问题。所以,李希凡此文并不着眼于“民族风格”,而是让“传奇”与“革命浪漫主义”连通,把“传奇”与革命现实主义的融合问题,在总的名目上转化为富有传奇性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融合问题。随后,他的重点便是在此基础上阐述:《林海雪原》“富有传奇特色的革命浪漫主义基本上还是渗透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描写里”,它的传奇性归根结底“是突出了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56]。

其论述的第一步,是把小分队英雄战士取得胜利的能力和品质归功于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与脱离时代生活的武侠撇清关系。他说杨子荣在威虎山的胜利,依靠的不是武侠特技,而是共产党员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久经锻炼的机智沉着;刘勋苍、栾超家、孙达得也不是武侠,因为他们性格的主要方面,勇敢、智慧和坚韧不拔,是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教养出来的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57]。李希凡这段话,既挖掘了《林海雪原》传奇性的情节与人物的现实基础,也增强了其中的党性与人民性。

接着,他进一步表示,在小说传奇性的情节里,人物的英雄性格的特征又是展现在现实生活的真实画面里。他以智取威虎山为例,说这个《林海雪原》中最富有传奇性艺术特色的情节丰富地表现了杨子荣性格,传奇性和故事的适度夸张在此并未

离开特定环境里人物性格、心理的真实刻画，所以杨子荣在威虎山的每一个行动和谋划都从生活真实和性格真实里表现出合理性^[58]，意即在对英雄人物性格的刻画中，“传奇”没有妨碍真实。这里的真实，侧重指故事情境里人物的心理活动、行为反应符合逻辑上的合理与性格的一致性。

李希凡同年另有一文，亦以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说明，只要以英雄形象作为情节的中心，使情节的发展紧密地融合着性格的创造，哪怕是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的紧张惊险的情节，也能令人信服^[59]。从该文看，《林海雪原》中做到这种融合的，也只有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只是在《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里，他不点破，而由此推及《林海雪原》艺术形象的整体创造，论定其传奇性都是寓于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表现的真实描绘中。但他也没有再具体分析人物形象，而是转到作品的题材，强调作者是通过传奇性的军事斗争题材，歌颂革命战士的精神品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的的一个侧面^[60]。

如此层层递进，李希凡具体论述了《林海雪原》富有传奇特色的革命浪漫主义如何渗透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描写里，其“传奇性”如何突出了人民战士的英雄形象，从而反驳了冯仲云认为它很难称为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观点。他总结道：小说富有传奇特色的斗争生活与英雄人物反映了时代精神，表明有共产党的教养才有这样的英雄战士，有这样的战士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此即其革命现实主义的表现；读者能从中看到党的光辉形象，深受感动和教育^[61]。至此，他终于综合小说塑造英雄形象的倾向性、党性、人民性、时代精神、教育意义等，论证了《林海雪原》的“传奇性”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与精神。

然后，李希凡才去应对冯仲云提出的历史事实与地理地形的不真实。他表示这说明小说作者在素材处理上经验不足，但这并未损害小说所反映的生活真实和艺术形象的真实；反倒是冯仲云用几个细节失实的例证批评《林海雪原》的传奇性和真实性，混淆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界限，离开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这些说法与此前的讨论相去不

远，不同的是他还在逻辑上倒回去强调：发生此混淆的冯仲云“自然也就丧失了判断作品是否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根据”^[62]。这实际是否定了冯仲云评判作品真实性的标准与资格。

李希凡此文刊出两天后，罗荪亦有短文批评冯仲云，表示不能因为小说引用了个别真人真事就要求小说按历史事实原样表现，还说并无读者根据《三国志》订正《三国演义》的章节^[63]。这结合冯仲云文结尾说的应澄清读者的“《林海雪原》是描写真人真事的小说”的印象^[64]看去，反而耐人寻味。读者不据《三国志》订正《三国演义》，是因为《三国志》已然作为正史存在。稍有常识的读者，亦不会把《三国演义》的情节全然当作历史事实。可《林海雪原》没有与之相应的先在的正史流传，即使有，知名度与小说和电影也不可相提并论。曲波宣称《林海雪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前期编辑推介、文艺评论也采取这个提法。冯仲云此文，正是要对此起订正效果，而由此引发的大讨论，恰恰帮助这个效果完成。经此笔谈，《林海雪原》比原先更固结为一部“革命英雄的传奇”^[65]，而与历史事实的真实做了明确的分野。

其中一个症候性的表现，即李希凡这篇总结性的文章根本不提《林海雪原》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成，而说是作者从原有生活素材中提炼的传奇性的题材。这种前提性的说法，意在取消历史真实对《林海雪原》的“传奇性”与“不真实”的批驳，但同时也就摘掉了小说本身的历史真实的面罩，愈发凸显其传奇性。而对传奇性的辩护，又只能在特定环境、主题精神里阐发，才能不妨碍小说的现实性与真实性。这里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如何缝合“传奇”与“真实”的裂隙，亦即阐述过程，这也是本文如此大段引述李希凡文的原因。“传奇性”只能在诸多限制、牵扯、依附中，变形、捆绑、缠绕。也正因如此，阐述的过程必定夹缠、拖沓、讲究论述策略，这在李希凡此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此费力为《林海雪原》的传奇性辩护后，次年李希凡评《红岩》时，却特别点到《红岩》“没有任何取媚读者的廉价的‘传奇’性”^[66]。1964年侯金镜亦有文章补充提醒，迎合读者的传奇性，可能会妨碍作者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追求^[67]。“传

奇”之尴尬，显露无疑。这也愈发说明他们对《林海雪原》的肯定与回护，并非满意，而像权宜之举。“传奇”倒也并非不合法，毋宁说是灰色的，但一经点破，难免暴露其与真实和现实之间不可消弭的裂隙；评论者努力缝合此裂隙的论述，又往往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其间存在着裂隙。

既然批评某些传奇性“取媚读者”，李希凡为何还要为《林海雪原》辩护？从新文艺的实践看，“革命英雄传奇”的生成，有其在培养工农兵作者、讲述革命历史、塑造英雄形象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类传奇性的英雄故事适应了大众的阅读趣味，能够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斗争”^[68]里，“起到击垮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阵地的先锋作用”^[69]。在新文艺的整体构想中，其所从属的文艺的群众路线、普及工作，正是未来文学艺术普遍繁荣的保证^[70]。如此整体性地看待《林海雪原》的生成、接受和起作用的方式，便知其在当时为何受到承认与鼓励；同时，也知其在新文艺的建构中具有过渡性，其普及性主要是一种否定性功能。

当促成其普及性的传奇性面临革命现实主义的质疑时，评论者便不得不从小说内部为“传奇”辩护。待李希凡将“传奇”与“革命浪漫主义”连通，“传奇”终于在《林海雪原》中焕发最为强烈的新质。但传奇性的《林海雪原》在文艺指导者那里，亦非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典范，甚至说革命浪漫主义都有些勉强。这不仅是小说思想高度的问题，也有体裁与手法的配合问题。如茅盾所说，“两结合”在新民歌中卓有成效，是因为新民歌是抒情的且多为短诗，不要求故事性和形象性，便于用超现实的比喻和夸大手法表达远大理想^[71]。反过来说，体现在小说中的传奇性，过多运用夸张与想象表现革命浪漫主义就有原生性的不足，总会留下俗套与破绽。放在李杨说的当代文学叙事、抒情、象征三阶段看，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与“人民”共同本质的获得，使文学的主导话语形式从叙事转向抒情^[72]。1957年初版的《林海雪原》，标志着“革命英雄传奇”这类小说的命名，然其命名之时也是“叙事”形式盛极而衰之

期。有意味的是，此后《林海雪原》还被改编为戏剧。其“传奇性”最终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以高度本质化、象征性的表达，得到了解脱或者说飞跃。

[1]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分别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余昌谷《当代小说家群体描述》，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文东、王东《浪漫传统与现实想象：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牛运清编，第80—8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龙世辉：《“林海雪原”的人物刻划及其他》，《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

[6] 辉：《“林海雪原”》，《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第8版。

[7][11] 世辉：《略谈“林海雪原”》，《读书月报》1957年第11期。

[8][9][10][12][15][33]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13][14] 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16] 参见李惠贞、冯育柱《文艺作品选讲：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丝鸟《论“林海雪原”的创作方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7]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148—151页，三联书店2015年版。

[18] 贺桂梅：《1940—1960年代革命通俗小说的叙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

[19] 参见依而《小说的民族形式、评书和〈烈火金刚〉》，

《人民文学》1958年第12期。

[20]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见《〈林海雪原〉评介》,第119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21][30][35] 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22][59][68] 李希凡:《漫谈革命英雄传奇的情节和形象的创造》,《文史哲》1961年第1期。

[23] 路坎:《〈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24] 吴伯箫:《怎样写好书评和开辟稿源》,《人民日报》1959年2月18日,第7版。

[25] 详见《文艺报》1959年第18期版权页。

[26] 参见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第3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第82—91页。

[27][64] 冯仲云:《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见《笔谈〈林海雪原〉》,第3—7页,第7页,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

[28][49][50][56][57][58][60][61][62][65] 李希凡:《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见《笔谈〈林海雪原〉》,第85页,第85页,第77页,第77页,第77—78页,第78页,第79页,第80页,第86页,第89页。

[29]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01页。

[31] 《冯仲云年谱长编》,史义军编,第272页、第362—37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

[32] 冯仲云:《〈金玉姬〉真实地反映了抗联的战斗生活》,《电影艺术》1960年第6期。

[34]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第122页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6] 陈斯:《有心创特色:浩劫前北京日报副刊二三事》,《新闻与传播研究》1980年第4期。

[37][45] 《“笔谈〈林海雪原〉”小结》,见《笔谈〈林海雪原〉》,第99页。

[38] 详见金童、章仲锷、丁林的讨论,见《笔谈〈林海雪原〉》,第12—14页、第18—20页、第26—29页。

[39] 王冰:《历史事实不等于文学的真实》,见《笔谈〈林海雪原〉》,第9页。

[40] 王冰:《缺点掩盖不了成就》,见《笔谈〈林海雪原〉》,第16—17页。

[41] 李观鼎:《感人的力量从何而来?》,见《笔谈〈林海雪原〉》,第40页。

[42] 林涵表:《漫话〈林海雪原〉》,见《笔谈〈林海雪原〉》,第53—54页。

[43][44][47] 《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林海雪原〉》,见《笔谈〈林海雪原〉》,第63页,第74页,第62页。

[46] 陆京:《〈北京日报〉讨论〈林海雪原〉》,《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48] 《如何正确评价文学作品?如何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光明日报》1961年8月15日,第2版。

[51] 参见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第320—32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2]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53] 列·诺维钦科:《关于浪漫精神和现实主义》,华胥译,《文艺报》1959年第12期。

[54] 李希凡:《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文艺报》1959年第3期。

[55][71] 茅盾:《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人民文学》1959年第2期。

[63] 罗荪:《“太实则近腐”》,见《笔谈〈林海雪原〉》,第57页。

[66] 李希凡:《生活真实和理想威力的高度融合》,《上海文学》1962年第6期。

[67][69] 侯金镜:《〈创作论评〉后记》,《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第310页。

[70]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第2—3版。

[72]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罗雅琳